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胡 绳 主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责任编辑：肖淮苏 霍海丹
封面设计：胡燕欣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胡 绳主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地质出版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1 印张 480 千字
199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87000 册

ISBN 7-80023-284-0 / K · 303
定 价：10.50 元（精装本）

题 记

胡 乔 木

在 1990 年 3 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尚昆、一波同志都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的希望（现行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 1949 年，少数写到 1956 年，个别写到改革开放）。在这之前，在 1988 年 8 月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领导小组的同志也曾提出这个任务；当时还考虑最好能写出一部篇幅不太大的党史简本，以便于广大干部、党员阅读。

恰好，建党七十周年的日子临近了，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 1990 年 5 月就集中力量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工作，到去年年底，已写出全部初稿。今年 1 月，在胡绳同志主持下，约请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两位同志，6 月又约请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同志一起，进行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初稿提供资料，设计轮廓，功不可没；但是改定稿的整个水平是大大提高了。经过先后参加编写的十多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在今年 8 月完稿；完稿原定的时间推迟了，是为了遵守质量第一的原则的缘故。

我接到这个书稿，很是高兴，觉得它虽然没有能赶在今年 7 月以前出版，仍然没有失去纪念的意义，而且它的作用本不限于节日的纪念。它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

完善而完整的党史。当然，中等篇幅的党史并不能代替更详细的党史（如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已成上卷），但是我相信，它的内容也会给尚在编写中的更详细的党史许多帮助。

胡绳同志告诉我，如果因为时间太紧，不能看全部书稿，希望我务必把本书的第七、八、九三章和结束语看一下。我照办了。这三章确是比较难写好的部分。八大以后的十年曲折很多；“文革”十年是悲惨的十年，但这时期也并非只是漆黑一团；而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年中，却又出现了两任总书记的严重错误。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我读了这三章，认为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

当然，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党的七十年历史如此丰富，在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中不可能说得面面俱到，这是显而易见的。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至于编辑性的差错，恐怕更少不了。无论如何，写这样的书而能写成这样，是不容易的。虽然文出多人，稿经数易，终得集合众长，统一一条理，成为一家之言。积年余之功，竟初创之业，尤属可贵。

说是初创，也许不完全对。写这部书，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非白手起家。中央作了两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大的

是非有了准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文集先后出版，为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多年来许多老同志写了各种形式的回忆录，记载了历史上的许多细节；历史工作者编写了多种党史、军史、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等等；又有国家保存的大量档案，可资查阅。但是在另一意义上，仍然不妨说本书是初创。真正的史书不是抄抄剪剪就可以“撰”成的。在这以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书，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批准本书出版时，希望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再版时修订得更加完善。我和本书的作者们一样，热切地希望读者、教学者、研究者和熟悉各个时期党史情况的老同志们对本书多加指正，提出种种要求和建议，使本书再版时能得到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还得作必要的增补），以便更好地完成它在九十年代作为一部好的党史读本的使命。进入下个世纪，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至少书名将改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了。但是，话何必说得这么远呢？

一九九一年八月

目 录

题 记	胡乔木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2)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2)
二、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	(7)
三、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	(13)
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21)
五、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35)
第二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44)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44)
二、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50)
三、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55)
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64)
五、四一二政变前后	(71)
六、大革命的失败	(79)
第三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88)
一、革命进入低潮和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	(88)
二、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	(101)
三、革命走向复兴时的“左”倾错误和红军反“围剿” 战争的胜利	(115)

四、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和党内 “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129)
五、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144)
六、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52)
第四章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66)
一、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166)
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77)
三、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185)
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189)
五、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199)
六、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209)
七、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218)
八、整风运动	(226)
九、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233)
第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241)
一、战后政治形势与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241)
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246)
三、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255)
四、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266)
五、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271)
六、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	(278)
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285)
八、伟大的战略决战	(290)
九、将革命进行到底	(299)
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304)
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实现 ······	(311)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311)
二、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	(320)
三、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331)
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339)
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348)
六、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外交工作	(355)
七、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368)
八、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的完成	(382)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389)
一、八大和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389)
二、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404)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413)
四、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422)
五、“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的错误	(430)
六、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	(438)
七、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	(455)
八、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经济上调整任务 的胜利完成	(464)
九、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475)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484)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484)
二、“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499)
三、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	(510)

四、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527)
五、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534)
第九章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551)
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551)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560)
三、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	(566)
四、十二大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	(583)
五、十三大、治理整顿的开始和1989年风波的平息 ...	(599)
六、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继续前进	(611)
七、对外关系的调整和统一大业的推进	(630)
结束语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643)
曲折的经历	(645)
四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	(650)
前进的道路和目标	(655)
后　记	(660)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七十年的旅程。

七十年来，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并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七十年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在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贫穷而落后的国家里，夺取革命的胜利，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创造过使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也面对过许多棘手的难题，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它的前进，而只是使它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

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胜利，正在满怀信心地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勇迈进。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

回顾七十年的历史，使我们更加确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七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是先驱者们在缺乏先例的艰难条件下经过探索追求所得到的，是无数先烈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绝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生活。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喊出了那时多少爱国者满腔悲愤的心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

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雄。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历史总是不停步地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深刻化，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成长，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又开始了。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他 1894 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在 1905 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清朝政府，而这个政府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场革命号召推翻中国两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以前，虽然已有人受欧风美雨的影响而提出怀疑君主政治的思想，但他们不敢设想在中国推翻君主制度和由它代表的社会制度。孙中山鼓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

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

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回顾辛亥革命时写道：“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醉心于学习西方的时候，孙中山已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②。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主要是南方几个省的三合会等江湖帮会组织）和新军（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建立的、采用新式军械和新式训练的军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的失败都在全国民众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恶。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它取得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289页。

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被推翻的清皇朝既是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的专制政府，就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它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失败了。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中国共

^①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页。

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业绩，而辛亥革命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如果脱离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观察问题，也许会把辛亥革命看作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①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②因此，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

^②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二、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来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的机会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这些活剧一幕紧接一幕地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概括地描述出当时的情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

现实有时是残酷的：人们在作出那样大的奋斗和牺牲以后，换得的竟不是当初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实行过，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说来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着，将要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来。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他们由此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的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这时的思想家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如果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维新派还是披着孔学的外衣去干那“离经叛道”的事业，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也没有从正面去触动孔学的思想统制，那么，这时的思想家确是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光荣战士。尽管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如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的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也没有对人数最多的工农劳动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革命发